



清初著名谏臣李裊

□李金科

李裊（1597—1656），字龙衮，号澹园，明末清初高密景芝（今属安丘）人，明末举人，清顺治间官兵科右给事中，以直言敢谏闻名，《清史稿》有传。

景芝李氏崛起于明末，明清时期景芝镇为高密、安丘、诸城三县分辖，镇多大族，隶属高密的望族以李、郝、杨最著。李裊祖父李懋桂，万历年间中举人，官至淮安府同知。父李衍庚，监生，官光禄署丞。据载，李裊年幼时，“读书能强记”，16岁中秀才，明泰昌年间以选贡入读国子监，崇祯九年(1636年)中举人。李裊家族富甲一方，明末明军王遵坦部经过景芝，擒获李裊，索其财物以助军饷，幸赖诸城人丁耀亢相救得以免祸。

清顺治六年(1649年)，李裊由会试乙榜授内院中书舍人。顺治十年(1653年)七月，升为礼科给事中，转兵科。同年十月，疏劾宋学洙典试河南时，“宿妓纳馈”，宋学洙被罢官。次年六月，升兵科右给事中。此后，接连上疏十余道，以直谏闻于时，与掖县（今莱州）李森先齐名，号称“山东二李”，当时朝中行贿者往往相互告诫，“勿令山东二李知”。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李裊针对当时苛刻的逃人法，上《谏逃东疏》。逃人法是清朝为严禁八旗奴仆逃亡和其他八旗人员逃旗而颁布的法令，清军入关后，大量圈占土地，强迫汉人投充，这些投充的汉人遭到残酷虐待，没有人身自由，引起大量逃亡，为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清廷制定极其残酷的逃人法。当时的贪官污吏和奸恶无赖假借逃人法，陷害无辜，大量被捕逃人及其株连者倾家荡产。当时有些汉族官员看到问题严重，曾上疏请改逃人法，而顺治帝却一再严厉斥责他们“更持武志”“殊为可恨”。寿光人魏瑄曾上疏劝谏，被罢官发配辽阳，汉官中无再敢为此谏言者。

李裊目睹民生艰难，毫无畏惧。他在《谏逃东疏》中尖锐地指出逃人法“可痛心者七”，其痛心者一云：“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莫不旦夕之命。是皇上为天之子，而独东人为皇上之人也。”同时在奏疏结尾中直言：“盖天下第一大事，无过此者，臣敢冒死为皇上痛切言之，刀锯鼎镬，不敢辞也。”奏疏言辞甚为激烈，还未上奏时，有亲朋见其奏稿，惊惧不已，劝其改稿，以免获罪，李裊拒绝说：“倘若污浊于笔，既不能奋然书我心中所想，又不能吐我胸中忧愤之症结，就此忧虑不言而老死终日，那实在是负有君国，抱恨九泉。”顺治帝见到李裊奏疏后命群臣商讨，王公大臣讨论后，认为“情由可恶，当论死”。顺治帝不许，改议杖，徙宁古塔；顺治帝命免杖，安置辽东尚阳堡。

李裊被解送离京时，心境平和，毅然就道，再次表明了自己决无懊悔之意。毛腾蛟《送别李龙衮奉诏诣尚阳堡》诗云：“朔风一朝起，严霜惨以冽。君为秦廷哭，举国惊欲绝。”“谁知今日泪，一字竟一血！”丁耀亢赠诗云：“哀鸿不散中原泪，得马南凭塞上尘。”李裊到尚阳堡后，与流放或遣戍的士大夫，如莱阳左懋泰、沾化李呈祥、寿光魏瑄、定州郝浴、泰兴季开生等人，以忠义节气为重，以诗文唱和。顺治十三年(1656年)五月十八日，不幸病卒于尚阳堡。季开生《哭李龙衮》诗云：“铁石知君终不改，乘箕万载壮幽燕。”僧人函可《哭李给谏》云：“史留忠愤疏，天丧老成人。幸有绋袍在，年年渍泪新。”李裊卒后，顺治帝曾称其“忠直”“不可以罪人论”。但顺治十五年（1658年）御史李森先请求赦免李裊之罪时，顺治帝不许。雍正元年（1723年），李裊入祀高密县忠义祠，《清史稿》为其立传，著有《李裊奏疏》。



春款秋付赊小鸡

□刘剑侠

“赊小鸡，慈伦（当地村名）大抱鸡啊！”儿时，我住在潍北白浪河畔华疃村的姥姥家。每年春暖花开时，村子的大街上经常能听到担着鸡罩的赊鸡人的吆喝声，悠长又响亮。

我们孩童被深深吸引，一窝蜂地拥上去看热闹。姥姥和村里那些缠着小脚的老太太们，从大街小巷蹒跚而出，缓缓走到赊鸡人的鸡罩前，先是轻轻从鸡罩里把那些小鸡一只只提出来，经精挑细选，最后才把最中意的小鸡放进自己的提篮里。然后，让赊鸡人在本子上记下自己的名字，并说秋后一定会按时付款，随即便提着小鸡回家了。

喂小鸡是件非常细致的活。刚开始的几天，姥姥要先把那些黄黄的谷米粒慢慢蒸熟，再用手指轻轻捻细，然后才喂到小鸡的嘴里。

待小鸡长得稍微大点时，姥姥就往小米里放些剪得很细的嫩草。小鸡吃得很美，纷纷争抢，非常有趣。

晚上，要提防老鼠、家猫等小动物伤害小鸡。夜深人静时，姥姥无数次起床看护小鸡，小鸡那稚嫩悦耳的叫声，伴我睡得好香、好甜。

渐渐地，小鸡长硬了翅膀，姥姥便将它们放到院子里。它们高兴地跳着、跑着，到处寻找小虫或碎食，身体也日见丰满。姥姥便开始为它们起名了，什么“小黑”“大黄”“鼓鼓头”等，只要一喊它们的名字，它们就会伸着脖颈、展着翅膀匆匆跑来，可爱有趣。

秋天到了，姥姥便留下几只中意的小母鸡，剩余的就拿到白浪河西岸的华疃大集卖掉。虽难舍难离，可只有卖掉部分才能还清赊鸡人的欠款。

几天后，赊鸡人登门讨赊鸡款了，姥姥把准备好的钱款爽快地递到赊鸡人的手里，还不忘让赊鸡人写下一张收据。

记得那年深秋，一位昌邑籍赊鸡人到我家收取赊鸡款时，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东乡侯富庄老侯收到鸡款两元整”字样，然后一边说着感谢话语，一边向邻居家走去。

姥姥不识字，我刚上学认字不多，当姥爷从地里风尘仆仆回到家看到纸条时，竟愤愤地对姥姥说：“东乡姓侯的有的是，这样的收据你也敢收？”不过，那时的人很讲诚信，从没听说为了生意多要钱或不给钱的事。

第二年春天，母鸡们开始下蛋了。姥姥便把卖鸡蛋的钱，换来了家人们的油盐酱醋和新衣新被，还有我上学的学费。那时，乡亲们都称鸡是“家里的小银行”，吃喝拉撒全靠它。

收音机旧事

□冯伟山

前些日子，我去本地一家古玩市场逛书摊，偶然看到了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暗红色，满身尘土，静静地躲在杂乱的旧书堆后。尽管它不起眼，还是让我眼前一亮，觉得很熟悉。忙上前仔细端详，只一眼，我内心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一丝亲切和激动瞬间在心头氤氲开来。

这是一台“春雷”牌收音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家就有一台，大小、颜色、样式，和这台一模一样。记得父亲把收音机买回家时，很兴奋，说这是“春雷”牌的，上海产，别看个儿不大，可是名牌呢。父亲一脸自豪，这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我家添置的第一件贵重物品。

父亲把高方桌用抹布擦了又擦，才把收音机小心地放了上去。收音机上有两个旋钮，一个管着声音大小，一个管着调台。父亲开了收音机，轻轻转动调台的旋钮，顿时唱歌的、唱戏的、说评书的、播新闻的，一股脑儿地涌了出来。音质清晰、立体感强，就像真人在眼前说话，简直就是一个宝贝。一家人的欢喜可想而知，觉得生活有了奔头，对未来充满了无限希望。

之前，我家也曾有过收音机，是爷爷从部队复员时带回来的，好像是“泉城”牌的，只模糊地记得是窄窄的一个不大的物件，大人都叫它戏匣子，也有叫半导体的。也许受了岁月的侵蚀，那个收音机时常“嗡嗡”地响，听不清，台也少，的确应该光荣“退休”了。这台老收音机来我家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但知道父亲对它有感情。听父亲说，当年这收音机可是火遍全村，晚上村里不少人来家里听节目，那叫一个迷啊，冬天夜长，听到半夜了还不想回家睡觉呢。现在想来，在那个物质、精神匮乏的年代，一台收音机的魅力可想而知。

从此，茶余饭后，这台“春雷”牌收音机便奉献出了它的全部热情，让我们一家人精神愉悦，留下了数不清的笑声。随着经济发展，不几年，收音机走进了千家万户。那时，我们这里家家户户种植黄烟，系烟叶、解烟叶或者秋天玉米收回家剥玉米皮，在那些漫长的时间里，基本都靠收音机的陪伴，打发了无尽的枯燥时光。王洁实、谢莉斯、蒋大为、程琳、苏小明、成方圆、殷秀梅等一大批歌手的作品通过收音机传遍大江南北，侯宝林、马季、冯巩、师胜杰、笑林等人的相声更是通过收音机扬名四海。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岳飞传》、单田芳的评书《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传》等更是火遍全国。还没到评书开播的时间，大家就都早早调好台等着，生怕耽搁了收听。有些在地里干活的一看时间到了，扛着锄头就往家跑。当年，收音机里的广播剧也是红极一时，著名演员王刚凭着《夜幕下的哈尔滨》一炮走红。“嗒嗒嗒、嗒嗒嗒，小喇叭节目开始广播啦！”少儿节目《小喇叭》直到今天还留在几代人的记忆中。那时的广播电台不论中央台还是省台、县台，基本都有“点歌台”栏目，全国各地的听众纷纷写信给电台，为亲人、朋友、同学、战友等人点歌，祝贺生日的、新婚的、乔迁的，虽然内容不同，但都是满满的祝福，随着电波越过千山万水，传递到无数听众耳中，振奋人心。

很快，电视机和录音机陆续走进万千家庭，收音机便风光不再。后来，我家的“春雷”牌收音机，被父亲送给了他一个单身且双目失明的表哥。老人很是欢喜，天天用它解闷，用耳朵感知这个世界的五颜六色和诸多美好。后来，老人去了镇上的敬老院，临终时父亲去看他，收音机还在床头静静地陪着他。

岁月如水，40年后意外邂逅这台我家收音机的“孪生兄弟”，还是让我非常高兴，它让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曾经的岁月。那些有收音机陪伴的日子，还是那么让人牵肠挂肚，那么让人心生温暖。